

中国古代的重农传统

□ 曹颖新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在农业占主导地位之前，采集、渔猎都曾经是人们食物来源的重要方式，畜牧业作为游牧民族的食物来源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但是农业成为食物来源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地理决定的，也是中国历史的选择。

农业基础地位的确立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第二阶段是连续种植的农业（亦被称为“传统农业”），第三阶段是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涵盖了前两个阶段。如果把这二者做一个比较，据统计，以每500公顷养活的人口为衡量标准，传统农业的效率是原始农业的20倍。

中国的传统农业出现较早，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就开始种植粟，公元前5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开始种植水稻。中国能较早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主要归因于先民生活时代中国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据竺可桢研究，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代，中原地区属于温和气候，周朝前200年气温有所降低，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气温再次回暖。在这漫长的数千年中，黄河流域长期处于亚热带气候，农作物生长期比现在长约40天，优良的种植条件成为农业累积发展的前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竞争加速了生产技术的提高，铁器农具得到推广，牛耕也开始普遍应用。到了秦汉大一统时期，随着太平日久，以家庭为单位长期躬耕田亩成为可能，人口增长导致土地相对稀缺，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显出优势地位。这种模式人为地提高了地力，也巩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方式，进而促进以家族为组织基础的村落的发展壮大。精耕细作的农耕模式可以高效地为农业帝国提供经济基础保障，密集的村落形制为帝国统一提供稳固的政治基础。到秦汉时代，传统农业在中国

成为主体产业，在此后的2000年里，农业一直是保障社会民生的基础产业，在农业经济长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农业文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文明。

农业优先的原则

既然农业是经济的第一来源，又是国计民生之本、政权稳固之基，所以历代政府都十分强调农业的地位，通过建章立制来实现农业优先的原则。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当时，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意识到，把治私田的劳动力量集结起来产生的效能是非常大的，于是都在提高农业效率和奖励农业生产上下功夫，在这方面展开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到了战国时期，更强化了农业的重要地位。在当时争霸的需求下，谁能掌握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粮食，谁能把国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得更紧密，谁才能胜出，要做到这两点，必须优先发展农业。秦商鞅变法把重农推向极致，采取了农战结合的举措，其核心是“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这一国策充分调动了想通过务农和军功改变命运的底层劳动者，最大限度吸纳了来自周边国家无地少地的务农者，在富国强兵上胜于六国，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西汉初年，经过连年战乱，国力疲弱，需要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为了抵御匈奴的进犯，粮食依然具有战略物资的性质，农业生产也依然具有战备属性。汉王朝一边面临这种战略需求，一边却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徒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晁错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贾谊也认为，农业是“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的立国之基。他们之所以都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受天时地利因素影响较大，在短期内人为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很小，土

地产出的剩余产品有限，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品交换，缺乏形成立体商业经济的条件，农产品更多时候只能具备养活人口的功能，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流通性产品。在生产力较低的时代，国家只能在维护农业的根基地位、扶持农业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效益上下功夫，以求得农业经济相对平稳，保持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持久性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国祚绵长的王朝时代，还是政权并立的分治时期，从官方到民间，自然经济性质的传统农业都备受重视。继两汉时期黄河流域传统农业长足发展之后，东吴的屯田制度和东晋人口的南迁带来了长江流域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南朝历代农业的累积，南方广大区域富有鱼盐之利，这才使南北物资交换成为可能，也为隋唐的文明波峰奠定了物质基础。唐代从贞观年间到天宝末年，农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即使经过安史之乱，到了中唐，田地亩产依然较高，据《新唐书·崔弘礼传》，唐文宗时期官员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人口也大量增加，到了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有800万多户，人口突破了7000万。唐代时，江南地区已经成为财税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得益于江南地区更加优厚的耕种条件和垦农技艺的提高，唐诗中就呈现了这方面的状况。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说：“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李商隐《赠田叟》中说：“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颍传深谷声。”“烧畬”和“伐树”都是为了垦荒，继而可以农耕，说明当时的农民变山河湖海为耕地的能力较强，开发农垦的意愿强于依赖渔业和林业为生的意愿。

与他者互动的传统农业

中国历史上，在传统农业占主导的中原地区，渔猎、造林、游牧和纺织一直都与农耕并立，但是只能作为农耕的补充。而以游牧为主

集渔猎为主的东北地区等地，农业经营的成本较高，一直没有实现原始农业向传统种植农业的转变，所以，农业只能作为这些地区人们的副业。事实上，中原地区虽然选择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但是并不排斥其他产业形式和生活方式，各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各异，这种选择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造成了互补。

以农牧分界线为例，可以看出农业与畜牧业的竞争与融合的历史。农牧分界线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划线，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农牧交错带。在西汉到南宋时期，农牧分界线基本保持在龙门到碣石一线，之后，这条线逐渐北移，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条依据自然条件划分的分界线。

在游牧区域，也曾有过规模的农耕文明，比较典型的是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统万城。赫连勃勃采纳了“蓄力待时，详而后举”的策略，选择在农牧交错地带建立匈奴人传统的单于庭，是出于退可游牧、进可征战的考虑。统万城在开发时是水草丰美的畜牧区，同时兼有贮藏畜产的功能，随着居住日久，习惯于定居生活后，又依托于无定河流域在城南开发了大量农田，统万城成为了亦牧亦农的塞上江南。这位匈奴大王也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把他的单于庭变成了“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的城池，可见赫连勃勃汉化之深。

总之，把传统农业放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看，非农业是对农业的必要补充，中国古代经济整体呈现出无农不立、无农不富、无非农业而不足的局面。



从《家范》看古代政德培育

□ 尹传政

《家范》是司马光所著家训，因司马光身后受赠温国公，又被称为《温公家范》。《家范》共十卷十九篇，首载《周易·家人》卦辞以及节录《大学》《孝经》《尚书·尧典》《诗经·思齐》诸篇语录，作为全书之序，正文从《治家》至《乳母》。除首卷《治家》外，其余各卷按照祖、父母、子、女、孙、伯叔、兄弟姊妹等分类，根据不同的人在家庭中的不同角色，为其提供行为规范。《家范》“采集经史兼及子书中，圣人正家以正天下之法，及后世卿士以至匹夫，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系统地阐述了古代家庭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为历代社会士大夫所推崇。

司马光的《家范》把中国古代传统政德“家国一体”的核心价值观理念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在司马光看来，齐家就为了实现治国，从而最终达到天下平。司马光认为，若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不能管教好自己的家里人，却要去教育别人、教化百姓，这种事是不存在的。因此，司马光强调，治家“莫如礼”，并对齐家规范作出了规定：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为人父者，要“爱子教之以义”；为人母者，“不

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为人子者，则应以孝为天经地义，为行动之准则。

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不仅对“家国一体”进行思想层面的论述，还在实践操作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从祖、父、母、子、女、妻等关系入手，通过圣侯之言和王侯将相的故事，为家庭成员树立典范。这是因为，爱护自己的亲人，是用来爱护自己的；爱护天下的民众，是用来爱护自己的亲人的。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自身就会稳如泰山，永无危殆，别人怎么能够侵犯、侮辱呢？所以，自古以来的圣贤之人，都是先亲爱自己的九族，然后才能够推及施加到他人身上。不言而喻，个人修为不仅对规范自身行为极为重要，还影响到家庭成员。更是最终涉及每一名社会成员。因此，只有做好自我，才能实现正天下的目的。

《家范》提出了以廉以俭、以德以礼的家庭教育对后代为人从政的重要性。家风德育在家庭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在家训中指出，“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司马光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

因为中国古代人普遍的做法是：“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畦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国仓，金帛充篋笥，慷慨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作为祖辈，没有希望能为儿孙谋利的，可是真能谋利于后代的却很少。对此，司马光认为，应该用为人处世的道理来教育子孙，用遵纪守法来管理家庭。否则，就会导致子孙后代只知道追逐利益，而没有了道义，“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因此，在司马光看来，圣人和贤达之人的高尚品质不仅对自己有利，还能够惠及子孙，他们留给后代的是高尚的品德修养和完善的立法熏陶，传予子孙的是廉洁的品质和俭朴的作风。

《家范》鲜明地提出了严格家人教育对为官从政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家训中的“严私德”不仅要求对自己严格，还要严格教育家人，管好子女，教育好妻子。《家范》对于如何管好家人提出了众多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做法。司马光认为，家风的形成从一开始结婚成家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正家之道，靡不在初”。这是因为一

旦对家人过分宠爱、纵容，就会带来恶果。其中对妻子而言，“初而骄之，至于狼狽，浸不可制”。对于子女来说，“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司马光认为，自古以来，过分宠爱子女带来恶果的事例举不胜举，多少人只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却不懂得如何教育他们，以至有些人变成危害他人、辱没祖先、扰乱社会甚至是亡命天涯的人。爱孩子就应该教育孩子，培养他们成人。疼爱他们，却让他们走上邪路，哪里是真正地爱孩子呢？显然，家风家教管教不严，必然对从政者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对待孩子，就要从小进行管教，“儿幼未有知耳，俟其长而教之。”是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不多哉？”对于妻子，不仅要使其自身具备德行，还需使其可以辅佐丈夫，助之功成名就。所以《卷耳》求贤审官，《殷其雷》用义来劝诫丈夫，《汝坟》勉励丈夫做人要正直，《鸡鸣》警戒相成，这些都是贤内助的功劳。



社会主义一经产生，就不仅仅是思潮，同时也是运动。即使是空想社会主义，也绝不仅是坐而论道。德国宗教改革时期闵采尔领导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期爆发了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18世纪下半叶法国大革命时期也产生了平等派的运动。平等派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它的领导人是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家——巴贝夫。

“最不妥协的敌人”

18世纪是革命的世纪。经济上，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大的工场人数已经有上千人。资本主义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从组织经济领域活动扩展到组织政治领域活动，资产阶级壮大起来，生产力的革命最终引发了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1760年，巴贝夫出生于法国皮卡迪省，小时候家里很穷，15岁就离开家独立谋生，一边做学徒，一边努力自学，读了卢梭、狄德罗、摩莱里、马布利等启蒙学者的著作。后来，他从事封建土地法顾问的职业，开始关注和思考封建特权、社会改革等现实问题，也曾写具体改革方案期望能被当局重视，但石沉大海。他与朋友讨论时人发表的《普遍存在的极端贫困的原因及其根除存在的爱国陈情书》时，无奈地评论说，要实现这绝妙的计划，看来“要进行一场大的革命”。

革命真的爆发了。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克，法国大革命拉开帷幕。巴贝夫的热情和希望被点燃，用他自己的话说，1789年前，他只是档案管理员和土地测量员，而革命一压迫，他就一跃成为自由的宣传者和被压迫人民的维护者。大革命的热潮迅速从巴黎扩展到各地，巴贝夫在家乡发起领导抗税运动。一位居民说：“巴贝夫先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英雄。他是包税人及其喽罗们的最不妥协的敌人。”巴贝夫发起请愿运动，在全法取得广泛响应，八百个村镇的请愿书从各地涌向国民议会。他很快便因此被押入狱。

出狱后，巴贝夫创办《皮卡迪通讯报》，不遗余力宣传鼓动共同分配共有财产、全面取消封建特权。市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无奈地说，税收问题刚平息，产业问题又起，这是本市居民巴贝夫几篇文章的产物。

“人民的护民官”

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要求自由的政治革命完成了，要求平等的社会革命却失败了，中下阶层的诉求并没有受到重视。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大革命竟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由启蒙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越来越令人失望，无产者和其他社会下层仍然贫困，甚至赤贫。民主、平等都只是理念上的，是虚伪的。1794年的“热月政变”推翻雅各宾派专政，大革命的上升势头就此到了尽头，开始倒退。

现实教育了巴贝夫。他在自己主办的《言论自由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热月政变是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内战”，公开号召人民推翻热月党人的政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格拉古·巴贝夫，将报纸改为《人民的护民官报》，一心效仿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护民官格拉古兄弟，为平民而战。

1795年冬天，因为饥饿和寒冷而倒毙巴黎街头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也包括巴贝夫的幼女，令再次被捕的巴贝夫伤心欲绝。一出狱巴贝夫便声明：“专制暴君昨天把我释放，如果今天我在他们眼里不成其为叛乱者，那末我就是自己使我成为一个罪人。”他公开发表了狱中起草的《平民宣言》和《恢复真正平等的伟大宣言》，阐述实现真正平等的路径，就是建立公共的管理，取消私有制，使每个人从事擅长的生产工作并将成果交给公共仓库，遵循平等原则分配消费品。

至此，巴贝夫以启蒙学者的平等理论为依据，提出了法国无产阶级“特有的战斗口号”。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

“平等派密谋委员会”

“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1795年12月11日，巴贝夫在报纸上宣告革命到底的决心，“意思是我们起义，反对那不再合适的事物的状态……革命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直到他成为人民的革命为止”。督政府将巴贝夫视为最危险分子，下令逮捕他。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进入密谋阶段。1796年3月，巴贝夫与狱中认识的革命者们联络建立了“平等派密谋委员会”，秘密组织

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

马克思为什么称平等派为

□ 张源

武装起义。

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团体，成立了“起义督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组织程序，有明确的斗争目的和武装起义计划，还制定了施政计划大纲、经济计划大纲等，计划实施财产公有制和平均分配，成立“平等共和国”。同时，他们也与巴黎各区的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有联络员专门了解工人要求，宣传革命思想。他们把报纸、标语、小册子等宣传品散发到外省，进行广泛动员，里昂等地区都受到影响。

平等派定于1796年5月11日发动一万五千人参加的武装起义。但起义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巴贝夫及其战友们被捕了。巴贝夫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唤醒真正的人民，建立起幸福的王国，平等与自由的王国，人人丰衣足食，人人平等自由，人人生活幸福，这就是在全法面前被人描绘得凶神恶煞的那些所谓知名暴乱者的愿望。”

1797年5月27日，巴贝夫被押上断头台。临行前的深夜，巴贝夫给亲人写了最后一封信：“我是为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要使你们幸福，我觉得，就要使人人都能得到幸福，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贡献与局限

平等派是在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运动先驱。正如恩格斯所说，法国大革命之初，资产阶级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当革命继续深入，群众逐渐醒悟，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揭竿而起，为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而独立战斗。平等派第一次明确以革命的名义、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建立了严密的政治组织，第一次具体计划了实现“平等共和国”的过渡方案，第一次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将他们视为怜悯和同情的对象，并提出“人民革命”的观点。

但是，平等派的主张是农业的共产主义。他们关心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也了解手工工场的问题，但他们的批判主要指向农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他们主张的共产主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没能站在时代前列客观看待工业化和城市化现象，因此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倒退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理论。

